

走过世纪门

——中外报告文学论略

龚举善 著

红旗出版社

走过世纪门

——中外报告文学论略

龚举善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过世纪门: 中外报告文学论略/龚举善著.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03.8

ISBN 7-5051-0864-6

I. 走…

II. 龚…

III. 报告文学—文学研究—世界—20世纪

IV. I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0182 号

走过世纪门
——中外报告文学论略
龚举善 著

责任编辑 肖景华 封面设计 李惠民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100727 地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E-mail: hqbs@public.bj.cninfo.net

编辑部 84049774 发行部 64037154

印刷: 廊坊市百花印刷有限公司

2003年8月北京第1版 2003年8月河北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7.3125 字数: 187千

ISBN 7-5051-0864-6/Z·214

定价: 12.80元

序 一

谢 冕

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中国的诞生和兴起，与中国新文学大体同步。它是新文学的一个品类，有时也被归入广义的散文中。但我以为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单列更为适宜，因为它毕竟与一般的散文有较大的区别。一般的散文只需遵从文学的规律，而报告文学除了受到文学的某些限定之外，更主要的是受到了新闻的限定。

中国的报告文学既与中国文学在 20 世纪变革性的新生有关，更与近代以来新闻传媒手段的兴盛和发达有关。“报告”是新闻的行为，除了一般篇幅稍长之外，与通常我们熟悉的新闻报导实质上并无区别。不同的是，此种报告在这里被赋予文学的性质。它从新闻中剥离开来，成了隶属于文学的一种文体。报告文学既是“报告”，又是文学，它是一种两栖的文体。作为文学的一种，我们当然更为关切它的文学性。

需要判明的是，文学在什么规模和什么程度上“限定”了“报告”，从而使原先作为新闻的文体被赋予了文学的性质。文学对于“报告”的施加，首先是它的形象性的表达、相当广泛的文学手段的有节制地应用以及受到鼓励的抒情性的充分加入、语言的生动优美的要求等。正是这些文学元素的进入，使原先较为纯粹的新闻品类变得不那么“纯粹”了。也正是这种不“纯粹”因素的加入，使此一原先的新闻文体具有了美文的性质。

当今学界对于报告文学是否允许虚构存在着分歧的看法。但我个人坚定地认为，尽管文学对于报告文学的浸润可以非常宽容，惟一的一个例外，是对于文学至关重要的虚构，在这里受到了排斥，是绝对不可通融的。报告文学的生命是对于人物、事件的绝对真实，而虚构完全有可能伤害此一根本。除此而外，也许还有传统文学的典型化手段，在报告文学中也需要慎重对待。

报告文学也有区别于一般新闻写作的地方，上面讲到的“篇幅稍长”，只是表象性的说法。其实，就一般而言，这一文体往往用来集中报导较为重大的新闻题材。内容的丰富，事件的复杂，决定着要以较长的篇幅来装载它。但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只是用来写“大”题材的，其实，“小”题材也可以做大文章。有一段时间，中国文学界兴起了“文学大报告”、“报告大文学”的热潮，以为非“大”无以成文学的“报告”，实在是认识上的偏离。当然，这些“大”报告文学的普遍忽视文学性，也是不可原谅的缺失。

中国的报告文学伴随着新文学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它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各个重大转折时期都留下了鲜明的文学性的记载。从早期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夏衍的《包身工》到宋之的《1936年春在太原》，这些前辈作家的劳作，奠定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坚实基础。随后又有华山等杰出的记者—作家，通过他们的文学之笔，生动地报导了在战场、农村、矿山、工厂发生的诸多动人故事。华山的《踏破辽河千里雪》、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以及徐迟的《祁连山下》，均是辉煌的接续。新时期以来，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更是创造了报告文学空前的繁荣期。

与创作的繁荣相比较，学界对于报告文学的研究，就显得相对地滞后。就是说，创作报告文学的作者很多，写作的成就也很大，但对它进行研究和批评的工作却很少，专门的研究者就更是

凤毛麟角了。正是在这种期待之下，我欣喜地读到了龚举善先生的专著《走过世纪门——中外报告文学论略》。这种欣喜，首先是毕竟有人——特别是像龚举善先生这样的年轻学人——未曾忘却并积极关注和投入这一文体研究的慰藉。更为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关注是非常专业化的。

龚举善先生长期从事文艺学和报告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导师尹均生教授对他的治学和研究给予过很高的评价。在我的印象中，龚举善对报告文学的研究是全方位的。他的研究视野非常开阔，论述的范围也相当地广泛深入。他的研究具有强烈的文化意味和历史感。如在叙述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历程时，他对此做出了阶段性的归纳：30年代的救亡型，50年代的建设型和80年代的改革型。这种归纳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从中表现了作者知识积累的丰富和宏观概括的能力。不足之处在于，相对于报告文学的全面研究而言，这种划分大体停留在宏观描述上，还有待于深入到文体自身的建设方面，诸如风格的成立和演变，个人的和整体的审美风尚的把握和总结等。但我已经知道，他的有关这方面的建构正在进行之中。我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他会有更为重要的著述面世。

但即使如此，他所做的工作已是相当有成效了。例如关于左联与30年代报告文学的研究，他取向于文化发生学方位的考察，就是很有新意的。再如在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考察方面，他取向于现代意识的检视、主题学方位的研究和文本品格的多方询问，可谓别开生面。又如，他为转型期的中国报告文学梳理出五种文化理路，表现了很强的理论整合能力，颇为大气。同时，他对新时期报告文学美学品格的解析也显示出一位青年学者并不多见的精到。龚举善先生的研究不仅涉及中国的报告文学，而且涉及世界领域的报告文学与广义的纪实文学。他围绕斯诺创作所进行的研究颇为深入，关于世纪之交的国际报告文学以及全球化背

景下的纪实文学的发展态势的回望与前瞻，亦多有创见。

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我更为欣赏他对报告文学的“良知与正义”、“批判性文化品格”这些品质的强调。他的这种强调表现了作为年轻学者非常可贵的信仰与追求。还有一点，也是我要着重指出的，这就是，学问的范围很大，以一个人毕生的精力去做，也难以尽善尽美地做到。也许天才是个例外，但我并不迷信天才。因此，认定一点，坚定地、锲而不舍地、一点一滴地去做，如现在龚举善先生在报告文学领域所做的那样。我以为，这就是值得提倡的学术品格和治学态度。

2003年春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序 二

尹均生

我国报告文学的繁盛期始于 80 年代初，此后经历了不凡的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改革开放的决策冲决了闭关锁国的局面，大开国门，既要洞察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流向，又要关注当今繁芜精彩的外部世界。而作为真实记录与报道 20 世纪风云的报告文学，自然吸引了部分学者的视线。

与此同时，中国报告文学在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作为思想解放浪潮的前驱，发表了一批冲破精神枷锁的优秀作品，如《哥德巴赫猜想》、《亚洲大陆的新崛起》、《正气歌》、《命运》、《大雁情》等，为涤荡极左思潮，控诉“四人帮”的法西斯罪行，迎接知识与科学的春天，起了振聋发聩的号角作用，不仅引起了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褒扬，而且也激励了全国报告文学研究者的热情。

1979 年 6 月，著名报告文学家黄钢、理由和全国高校及武汉新闻出版界计 60 余人在武昌举行了建国以来第二次报告文学讨论会，对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报告文学的特质、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讨论。与会代表对中国报告文学在中国革命历程中的作用及现实影响作了充分肯定，一致认为报告文学的研究和整理大大落后于创作繁荣的现实。

1981 年 1 月，以黄钢、华山、理由为主编的《中国报告文

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在汉成立，以华中师院尹均生、武汉师院涂怀章、西北大学李文瑞、江汉大学杨江柱、苏州大学朱子南为骨干的编纂队伍建立起来，组织五校教师广为搜集、整理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丰硕成果。经数年努力，具有近一千万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一部以文体编集的《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香港《文汇报》突出报道，国内及东南亚华人文学工作者倍加赞扬。他们称誉“这套丛书反映了报告文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主干，展现了我国报告文学各个时期、各种流派、各类形式的主要硕果”，“向读者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教科书”（《光明日报》，1983—11—6）。这部丛书为中国报告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可贵的丰富资料。

1981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学院、国际政治学院、南京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大学、苏州大学等20所高校在穆青、魏巍、黄钢、姚远方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把研究目光投向了20世纪风云的记录——国际报告文学领域。其宗旨是研究国内外报告文学的发展及趋势，介绍国外报告文学作品及动态，以繁荣我国报告文学创作。

1984年，在邓颖超、黄华同志的关怀和指导下，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1991年更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自1984年至今，这两个研究会举办了关于斯诺、史沫特莱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约20次，其中7次是在武汉召开的。所以萧乾说，中国研究报告文学的中心在武汉。

几年来，武汉斯诺研究中心先后出版了研究斯诺等人的文集《斯诺怎样写作》、《纪念史沫特莱》、《斯诺》评传、《毛泽东的故乡》、《中外名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故区》、《20世纪永恒的红星》等，并同美国、日本的斯诺研究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此

同时，十多年来，华中师范大学培养了一批国际报告文学与斯诺新闻学方面的研究生和国内访问学者，撰写了近百篇关于国际报告文学和斯诺新闻学的研究论文，对中外报告文学尤其是斯诺在新闻学和报告文学方面的杰出贡献，对他在中国抗日战争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他作为新闻记者的崇高人格作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龚举善同志于1996年金秋，作为国内访问学者来到华中师范大学进行研修。他一入校，就以十分刻苦的精神、风发蹈励的热忱投入到对中外报告文学和斯诺学的研究之中。他几乎是废寝忘食地阅读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和斯诺的所有著作。1996~1997年，正值埃德加·斯诺采访陕北60周年暨《西行漫记》发表60周年，全国相关学者在西安和武汉分别举行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学者的聚会，显示了斯诺及其巨著《西行漫记》在世界新闻史和国际报告文学史上的重大影响。这一机遇，极大地触发了龚举善的学术灵感，仅短短几年，就在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了10多篇有分量的专题学术论文。他的论文，有对中国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深入阐发，有对斯诺作品产生时代的宏观鸟瞰，有对斯诺作品丰富内涵的剖析，有对斯诺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中产生的灵智探讨，有对斯诺夫妇作品语言和表达艺术的中肯分析，有对“斯诺精神”和人格的崇高评价，更有全球视野下关于国际报告文学的全面审视。龚举善的文章有着独特的表达，宏观和微观、朴实与绚丽、热烈抒情和深刻论述有机地融为一体，很快受到学界重视。他的报告文学和研究斯诺的论文，大都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或摘编。这对于一个青年学者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由此也被推举为湖北省跨世纪学术骨干，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入选，十堰市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龚举善出生在鄂西北山区一个贫困的

乡村，大学毕业后仍在山区报效故乡父老，默默地为鄂西北山区培养着合格的中学教师。山区农民勤奋刻苦的优秀品质对他的治学产生了巨大的内驱力。在研究报告文学和斯诺期间，正值其父母相继病重病故，他本人同时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与行政工作，但这些都从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他的研究热情，篇篇文稿联袂而出。在目前人们追逐金钱潮的社会环境中，他的这种孜孜以求、负重涉远的精神尤其显得可贵。作为他的导师，是深以此自慰的。

由于中外报告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国内已有七八所大学开设了这门选修课，而且早已列入新闻学硕士学位专业。但是，该学科的开拓者们均已进入老境，当前正处于后继乏人的局面。当此之时，红旗出版社慷慨支持龚举善同志这本报告文学论文集的出版，无疑是对有助于世界的和平进步、能有效促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新型文学形式的有力推动。

如上所述，一个人学术上的进步和成就，在汪洋浩博的学海中不过沧海一粟，但这也有赖于有利的时代环境、前人的披荆斩棘和浓厚的学术氛围。龚举善同志的个人努力和上述条件相融合，因而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希望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成为他学术研究的新起点，充分发挥出他的学术潜力，在教学科研上取得新的成绩。

时值仲春，窗外阳光灿烂，万物生机盎然。是为序。

癸未春于桂子山日月斋

目 录

序一.....	谢 冕 (1)
序二.....	尹均生 (5)
中国报告文学的文化发生学考察	
——“左联”的报告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	(1)
勇立潮头挽大风	
——20 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三次浪潮	(15)
世纪末的救赎	
——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主题学研究	(32)
新时期报告文学美学品格的多维形态	(42)
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现代意识	(60)
转型期中国报告文学的文化理路	(69)
故园情结与激情言说	
——梅洁《山苍苍，水茫茫》的文化人类学审读	(95)

一位应被颂扬的伟大女性

——缅怀海伦·福斯特·斯诺…………… (117)

斯诺“中国情结”系统观…………… (127)

文化的投影：斯诺的中国文化观…………… (137)

《红星照耀中国》的生命意念、民族意识和人类意味 …… (146)

世纪之交国际报告文学的回视、定位与展望（上）…………… (172)

世纪之交国际报告文学的回视、定位与展望（下）…………… (183)

全球化趋势中纪实文学的文化承担与网络前景…………… (200)

后记…………… (217)

中国报告文学的文化发生学考察

——“左联”的报告文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

“左联”之于30年代报告文学思潮的启动与推进，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概念引进与理论鼓吹；抗战与反封建两大主题的理性确认；三大“原型”文本的递进式实践垂范；“盟主”鲁迅的特殊贡献。

走近 Reportage：概念引进与理论鼓吹

30年代以前，我国已取得一定的报告文学实绩，然创作理念尚不明确，文体意识远未自觉。先期予以准确体认、高度重视并适时引进该文体概念的当推“左联”。

1930年，“左联”一成立，便呼唤文学界正视并创造自己的Reportage（报告文学）。在执委会^①于8月4日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一文中，确认工农兵通信、报告文学等文体是最能满足时代、革命和大众需求的进步文学样式。并明确指出：

我们号召“左联”全体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那边郁积着要爆发的感情，那边展开着迫切需要革命的非人的苦痛生活，那边横亘着火山的动脉，那边埋藏着要点火的火药库。那么，我们怎

样把这些感情，把这些生活汇合组织到最进步的阶级斗争中来，这就是我们应该坚决开始的工农兵通信运动工作。因这些不是单纯的通信工作而是组织工农士兵生活提高他们文化水准政治教育使他们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一种广大教化运动。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工厂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Reportage）吧！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能够从少数特权者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②

这表明：第一，报告文学是革命时代现实生活殷切召唤的产物；第二，报告文学的素材来自广大的工厂、农村、战线和社会的“地下层”；第三，报告文学的根本社会职能在于组织和提高工农兵的生活及其政治文化水准，教育他们起来为革命政权而斗争；第四，报告文学的创作形式和途径是灵活多样的，可通过小报、壁报及其他宣传方式予以实现；第五，惟其如此，报告文学才能“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

“左联”强调，为适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我们要信用这形式，它——报告文学，必须对大众读者有预约的无限的有力的效果。”并要求报告文学作家努力培育和不断提高三方面的素养：“一，敏锐的感觉与正确的生活的意志；二，对社会的强有力的感情；三，和被压迫阶级紧密的团结的努力。”^③1932年6月6日，“左联”核心刊物之一《文艺新闻》再度重申：“报告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要大众地建设广大劳苦大众自己的文学，这是最重要的一种文学的式样。”^④

可以肯定，在我国报告文学的文体意识刚刚自觉的起始阶段，“左联”有识之士就“报告文学”概念做出如此明朗而全面

的边界划定和理论鼓吹，充分体现了开阔的建设眼光和富足的学养储备，同时，与其对于世界大势和国内时局的深切关注、理性判断及自身拥有的历史责任感密不可分。

“左联”的革命性超前意识使之有可能预见到，当时的“世界早已划分为两大营垒：一个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它领导下的各小国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阶级，另一个是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它领导下的各资本主义国内无产阶级殖民地革命群众——的对立斗争成为现代历史的主要特征”。^⑤在此背景下，“帝国主义更加迫切的企图首先进攻苏联，消灭全世界工农的祖国，所以进攻苏联的战争，成为目前的主要危险。”^⑥那么，国内情势如何，中国无产阶级文学事业有何作为呢？“左联”分析后认为，“中国是世界资本主义统治最弱的一环，也是主要帝国主义矛盾集中的地方。因此，中国革命可以是全世界革命这个火山的最容易爆发的火口，也就是人类解放斗争的伟大叙事诗最后一卷的前奏曲。”当此之时，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转入崭新的为革命政权而斗争的时期，“这一方面当然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深入的关系。”^⑦

上述国内外客观时势，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左联”的“优势责任意识”，即主动承担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责任。他们认为：“‘左联’这个文学的组织在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上，不容许它是单纯的作家同业组合，而应该是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⑧1931年11月通过的该组织决议进一步强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目前不独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队伍，且又负起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总的领导任务。”^⑨由此可见，“左联”之果断引进并用力鼓吹“报告文学”以及坚持对新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权，绝不是出于简单的文体革命或花样翻新的考虑，而是客观情势与责任心态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因此

可以说——历史选择了“左联”，“左联”选择了报告文学。

抗战与反封建：多维视野中两大主题的历史体认

“左联”的时代，是内忧外患的时代，是革命力量谋求进步的时代，自然也是报告文学的时代。概言之，对外反帝、于内反封建是当时两大社会主题。其中，反帝抗战则是30年代的核心主题。此种主题，势必在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语境中得以显现和强化，并以“母题”形式成为解开该时代文学方程式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指出，20年代末至30年代，在国际环境影响下，国内发生了两种反革命“围剿”。“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⑩他认为，这种觉悟了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亦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⑪鉴于非常时期特殊的文化使命，鲁迅强调：“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⑫周立波则结合自身的创作实践说：“报告文学，简称报告，在目前的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新的民族解放运动时代的中国，民族危机已经不再是局部的事态，而一切救亡运动也都带着全国规模的性质。在这种局面之下，抗敌的文学不能空白，用事实做指南的报告就有它存在的价值”。^⑬这种关于文学主题高屋建瓴的历史体认，为30年代报告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左联”对报告文学的理性张扬，是因为该文体能够更真实、更迅捷、更有力地凸现上述主题。“左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